

做好議員橋樑角色 更好對接「十五五」規劃



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促進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明確支持港澳鞏固提升競爭優勢、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更首次提出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與此同時，特區政府亦正全速編制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日前，筆者與多位特區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同事一起考察北部都會區，包括到天水圍圍廠洪水橋/厦村的新發展區，也到訪了北都大學城用地和展館。香港五年規劃的編制，既要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亦要以北部都會區為載體，將香港的發展提升到新的層次。在這過程當中，立法會議員應該發揮好「上情下達、下情上報」的角色，將社會各界聲音反饋予特區政府，助力編制出更立體、更全面以及更惠民的香港五年規劃。

陳紹雄 立法會議員

提質增速北部都會區建設

特區政府將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定位為北部西面的「高端專業服務及物流樞紐」，提供專業服務、物流、住宅、政府設施等用地，未來將集產業用地、大學城與跨境鐵路樞紐於一身。特區政府正加快推廣「片區開發」模式，首個項目已展開招標，預計未來五年可提供大量熟地，當中包括產業相關用地。另外，北都大學城會推出土地供大學申請發展，配合預留資源，推動「學研產居」一體化，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教育及創科樞紐的地位。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等，這些都是香港必須提速提效推進的重點發展工作。社會各界必須思考，如何對接好國家「十五五」規劃，一方面讓北部都會區建設更快更好落實，另一方面讓北部都會區成為兩地融合發展的最前沿，讓香港更好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過去多年，新界北曾被視為香港的邊

陲地帶，發展一度滯後，有了北部都會區的倡議，各界開始將目光投向外處。值得注意的是，在推進數據園區、河套香港園區等建設的同時，我們不能忽略一點，就是北部都會區的基建，因為如果基建未能跟上，就會影響到北部都會區發展，甚至影響到整個香港的發展。

配套須緊跟建設步伐

對此，筆者建議，特區政府在可行情況下，盡量同時提速發展北部都會區的各項基建，包括爭取北環線各站實施「分段通車」，採用「先落成，先啟用」模式，以及盡快將北部都會區內北區、元朗等各區的公路網打通，好讓企業、大學、機構進駐時，能夠享用到高效便捷的交通網絡。

此外，民生配套亦十分重要。根據公開資料，未來的北部都會區的居住人口可能會高達250萬人，以今天香港人口計算，就是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口。因此，除了交通基建，醫療以至社區設施等，都必須要跟上發展。筆者在議會提

出，特區政府可以為現有的新界北醫療擴容，同時透過撥地支持等方式，讓新界北有屬於自己的私家醫院，既可服務區內居民，也能方便在內地工作的港人回港求醫。

編制香港五年規劃不只是特區政府的責任，立法會在當中也有相當重要的角色。立法會議員應該深入社區，接觸不同階層的市民和團體，聽取各種民生和行業建議，理解他們的所需所想，並將其整理歸納讓特區政府作出通盤考量，充分發揮「下情上報」的角色。同一道理，未來對於香港五年規劃的相關政策，立法會議員也應協助特區政府做好宣傳解說，向社會、市民就特區政府制定政策的原意以及目標「講清講楚」，發揮「上情下達」的功能。

同時，立法會議員還應擔當起香港未來規劃與發展的宣傳者，向世界說好香港故事，包括將全球各地企業及人才「引進來」參與其中，助力內地企業「走出去」，從而把香港的經濟「蛋糕」做大，也為國家現代化建設貢獻香港力量。

打破制度藩籬 推動灣區協同發展

陳紹雄 立法會議員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重大國家發展戰略，肩負驅動創新發展的重大意義，是豐富「一國兩制」

事業發展的新實踐。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指出，要「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強化科技創新資源保障、經濟發展、公共服務等方面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加強法治保障，充分發揮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試作用，加快建設國際一流灣區。」粵港澳大灣區與京津冀及長三角，都屬於國家「區域重大戰略」之一。2015年通過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及2025年實施的《關於促進長三角科技創新協同發展的決定》，是協同發展的法治保障，亦是區域協同發展的頂層戰略規劃和專項協同立法的典範，其發布背景對於大灣區三地法律體系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具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不能忽略的是，京津冀、長三角的協同立法是在同一法律體系下的區域協同，而粵港澳大灣區兼具「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獨特優勢，亦面臨法律制度、市場規則、監管體系差異帶來的融合複雜性，國際上亦沒有先例可循。

成果。2024年推出的《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行動綱領》，致力實現各套法律制度相互協作、各顯其利的「一灣區」目標。「港資港法港仲裁」在灣區內地城市實行就是一個範例。「港資港法」措施由前海擴展至深圳及珠海；「港資港仲裁」措施從內地自由貿易試驗區，進一步涵蓋粵港澳大灣區內地9個城市，增加業界服務內地企業的機遇，充分發揮香港「內聯外通」的作用以及普通法制度的獨特優勢，為企業「走出去」創造更佳條件。

破除制度壁壘 為融合賦能

將三地各具特色的法律制度轉化成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助力引擎，需要制度牽引。特區政府正編制的香港五年規劃，應就深化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開立專章、探討機制、處理三地法律衝突，破除制度藩籬，實現要素流動。鑒於法律規則銜接難以一蹴而就，前沿科技領域應以專項項目形式進行機制對接，由香港發揮引領者擔當角色，以法律制度的銜接為紐帶，打破區內制度政策不一及跨境數據流動等規則壁壘，在香港普通法框架下對接國際標準，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強強聯手，串聯各市優勢，推動區域產業深度耦合，將人工智能、自動駕駛、低空經濟及氫能經濟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併船出海，向外輸出國家技術及灣區標準，以增強香港的經濟發展動能，貢獻國家高質量發展。

灣區法治 走深走實

粵港澳三地涉及三種法域、三個獨立關稅區、三種貨幣，三地制度亦存有差異，為大灣區內制度銜接、規則對接及人才連接帶來挑戰。不過，只要善用三地優勢，妥善銜接三地法制，可構建起相互協作、各顯其利、合作共赢的區域協同立法新格局，定能讓粵港澳大灣區的法治建設走深走實。

三地政府一直以創新思維尋求政策突破，共同推進大灣區深度融合發展。在各方努力下，大灣區在實踐立法協同機制中探索出一系列創新路徑及

深度融合的法治建設是支撐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石。雖然三地規則銜接之路仍有不少難關要突破，但在國家的堅定支持下，三地政府要繼續維持創新思維，以協同機制銜接，掃除三地法律規則所產生的障礙，將制度差異轉化為合作紅利，實現區內法制互通，築牢大灣區法治保障，打造國際一流灣區。

以香港為橋樑推廣國家胸痛中心標準

王耀忠 醫院管理局聯網服務總監

4月3日及4日，第十五屆中國胸痛中心大會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及深圳同步舉行，匯聚了來自全球各地的醫療領袖與業界精英，在涵蓋人工智能輔助臨床決策、智慧急診應變系統、國際認證標準等前沿議題的多場專業論壇及專題講座上交流新知及經驗。

筆者深感榮幸，能夠親歷這個里程碑，並藉此機會分享香港公立醫院在急性心臟病救治領域走過的路。

胸痛中心：破解救治困局的答案

急性胸痛是急症室最常見的求診症狀之一，背後往往潛藏如急性冠狀動脈綜合症等高危心臟病致命威脅。急性心臟病救治，本質是一場需要爭分奪秒的接力賽。從院前到急症室，再到心臟科與心導管室，每個崗位的醫護人員都要在短時間內判斷出病人的危急輕重，分流、評估、診斷、決策、治療——每一步都需要時間，偏偏急性心肌梗塞最不願意等待，心肌細胞的壞死以分秒計算。如何讓各個環節之間的銜接更順暢、更快速，這些挑戰絕非香港獨有，而是全球醫療體系普遍面對的問題。

為此，胸痛中心的概念應運而生。胸痛中心並非單純一個物理空間，而是一套整合了人員、流程、技術與標準的系統性救治模式。透過設立快速分流通道、建立標準化臨床路徑、整合跨專科協作團隊，以及構建「院前通報」救護機制，將患者從發病到接受適切治療的整體時間大幅壓縮。

中國在胸痛中心建設方面走在國際前列。多年持續耕耘，國家胸痛中心體系不斷完善，認證標準日趨嚴謹，建設成果遍及全國各省市，並延伸至香港。去年，瑪

麗醫院成為本港首家通過國家胸痛中心標準認證的公立醫院，是中國胸痛中心建設向香港延伸的重要里程碑，現時威爾斯親王醫院按國家標準設立的全港第二間胸痛中心亦已投入運作，在優化胸痛救治流程、提升服務方面取得顯著成效，眾多病人直接受惠。以瑪麗醫院為例，胸痛中心成立後，急性心肌梗塞患者由到達急症室至送往心導管手術室從而令冠狀動脈血液恢復流通的時間(Door-to-wire Time)明顯縮短，此乃直接影響病人存活率的重要指標。

在地實踐跨越醫療體系不同

然而，香港公立醫院與內地醫療的體系不同，公立醫院在採用國家標準時需要評估現行做法與國家標準差異，按公立醫院實際情況修訂流程與指標。以院前救護為例：香港的救護服務並非由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管轄，分流、評估及救治在病人抵達急症室後才開展；而內地大部分救護車由醫院直接派出並有醫生隨行，醫生能在病人送院途中作出初步診斷，病人抵院後已經可直入心導管室。因此，醫管局採取了一系列將國家標準在地化的措施，透過院前急救系統、綠色通道及智能科技輔助等配套，將病人抵院至進入心導管室的時間大幅壓縮，盡量接近「直入心導管室」的效果。香港推行國家胸痛中心標準的關鍵，在於承認本地醫療架構的獨特性，不照搬內地模式，以本地經驗融入國家框架，最終建立一套真正適合香港實際環境的急性心臟病救治體系。

胸痛中心大會首次落戶香港

中國胸痛中心大會是中國心血管領域最

具影響力的年度盛會之一，今屆走出內地，選址香港，正是借助香港的國際視野與影響力，將中國多年積累的胸痛中心建設經驗向更廣闊的國際舞台推介，令更多國家和地區的醫療界人士得以了解、借鑒，乃至採納這套行之有效的救治模式。

中國胸痛中心聯盟在開幕典禮上正式發布《胸痛中心建設與認證標準(國際版)》。這份標準的面世，標誌着胸痛中心建設從國家層面走向全球。而香港的實踐經驗，印證了國家胸痛中心標準在不同醫療體系環境下的可行性與有效性，為其他國際醫療機構提供了極具說力的參考案例。

展望未來：繼續提升胸痛救治網絡

醫管局將繼續積極推動本港公立醫院胸痛中心的建設與提升工作，加強與內地的醫療協作。我們深信，透過持續完善院前胸痛處理機制、加強自動體外心臟除顫器(AED)的社區普及及應用，以及強化心電圖傳輸等智慧醫療技術的臨床整合，本港的急性心臟病救治水平將進一步提升，更多市民在緊急關頭得到及時、有效的救治。隨着人工智能(AI)的普及，今屆大會重點之一，是推動智慧醫療在臨床決策中的應用與發展。胸痛中心大會的「胸痛中心AI論壇」將觸及以科技重塑胸痛診療；專題講座亦會探索一系列AI應用，包括AI解析心電圖波形、AI的急性心肌梗死預警系統、AI導航技術實現血管介入精準導航、AI輔助心肺復甦應用等。

筆者可以預見，將有很多關於急性心臟病治療的思想碰撞在這兩日的中國胸痛中心大會發生，推動急性心臟病治療及服務發展。

揭露幕後金主 剖析政治利益鏈

張俊獅 香港恒生大學經濟及金融系副教授 澳洲悉尼科技大學客座副教授



第三眼 觀世界

上次為各位讀者介紹了學者江學勤所使用的「帝國周期律」。現在繼續向各位讀者介紹他的秘密歷史觀。

除了正統的學術研究，江學勤還研究很多另類歷史，以及一些「被隱藏的歷史」，包括秘密組織網絡歷史的研究。

主流學派研究國際政治及地緣政治時，往往會以一個國家的利益作為出發點。這種分析其實是充滿偏頗。因為一個國家的決策，絕大部分時候是由一小撮人拿主意。所以，在進行分析時，不應只執着於整體國家利益，而需要同時分析這些決策者的思想行為，視角才能夠更全面。

很多國家不是由人民意志主導和推動運作，而是由政客及其背後的一小撮精英所操縱。大家看一下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例子，雖然他是通過勝出民主選舉成為總統，但他與全世界進行貿易談判時，有諮詢過美國國民的意見嗎？他攻擊委內瑞拉時，有考慮國會的意見嗎？他攻打伊朗時，又有考慮人民的想法嗎？事實上，在大部分時候，特朗普都是自己與幾個幕僚決定一切，美國民眾的聲音無法左右。

雖然世界上很多國家實行黨派民主制，但政治人物需要通過選舉上台，當中涉及到龐大資金，這為贊助選舉的金主提供干政的機會。金主可以通過

政治捐款控制執政者，而執政者在位時，又會運用職權為自己、黨派及金主謀利益，使得執政者所作的決策，往往代表金主的利益多於國家的整體利益。近來沸沸騰騰的愛潑斯坦案曝光，使權力腐化，官商勾結等等黑幕暴露人前，令人更看清西方的政治現實。大家更加相信，即便西方社會高舉民主旗幟，但真正決定國家走向、國際格局與資源分配的，是不為人知的秘密組織網絡，因此外國一直有「影子政府」「深層政府」等的說法。

江學勤在很多視頻中，也經常提及秘密組織網絡對世界的影響。他曾說過，整個西方，背後是由「光明會」控制，而該組織有三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如果只用國家整體的利益作分析，而不考慮執政者背後受到什麼因素局限和操縱，這種分析得出來的預測，往往會與現實背道而馳。事實上，西方很多國家的決策，政客都是在受到背後金主影響下制定。所以，江學勤在研究國際關係及地緣政治時，也同時研究秘密歷史。

筆者從事「財權組織」相關的研究亦已數十年，研究過程中不僅研讀過大量外國資料，更常常前往不同國家，進行實地考察與調研。基於數十年來累積的研究與發現，筆者可以非常負責任地對江學勤的觀點予以確認：西方很多國家，的確是由秘密組織透過代理人進行操控，而愛潑斯坦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觀海論壇

撤軍還是僵持 特朗普左右為難

吳煒



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日內心的糾結顯而易見，一方面以4月6日為威爾遜推毀伊朗的重大能源和民生基礎設施，同時繼續調集地面部隊擺出進攻態勢；一方面不斷合理化自己的TACO(特朗普臨陣脫逃)輿論環境，譬如聲稱「伊領導層更替就是已完成政權更迭」、「霍爾木茲海峽和美國利益無關，中東石油需求應自行解決問題」等。各國尤其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不斷為停止戰事走協調，與美伊兩國的主要中間傳話國巴基斯坦，聯合發布了《中國和巴基斯坦關於恢復海灣和中東地區和平穩定的五點倡議》，使巴基斯坦的和平努力更具有國際影響力。筆者認為，撤軍對特朗普本人及其家族利益來說無疑是最佳選項，大概率也是其內心傾向。

圖謀多數未達成

筆者此前分析過特朗普此次發動對伊軍事行動的可能目的，包括掌握全球航道和能源中心、消除伊朗核潛力和核威脅、配合以色

列行動，以及家族在重建和資本市場中獲利等。開戰至今，除了配合以色列行動和家族可能在資本市場獲利外，具戰略意義的目的均未實現，甚至起了反效果，如過往平靜的霍爾木茲海峽航運風雲驟起。而縱觀特朗普的商業和從業經歷，「短平快」無疑是其最擅長的方式，持久戰並非其所願，一旦為解決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將戰爭升級為地面行動，大概率將陷入持久戰，衍生效應足以影響其此後任期甚至拖累整個美國。

雖然特朗普極力否認個人破產經歷，但其經營的企業發生六次破產卻是客觀存在的事實。這些企業在發起時均着眼賺大錢快錢，依靠發行垃圾債券高槓桿推進，但最終均敗於長期經營不善。由此可以看出，特朗普不是個精細化經營管理人才。而其之後可以東山再起，也在於認識到自己的短板，從而轉向個人形象營銷赛道。

持久戰不利於其自身

特朗普1.0任期和2.0任期至今的諸多政策，在開始推進時均大張旗鼓，一旦遇到阻力則迅速會出現虎頭蛇尾的跡象；過往的退

群、愛潑斯坦案件、關稅戰、ICE暴力反移民工作等，均呈現出這個特徵。脅迫各國或企業簽訂的數成百上千億美元的投資意向，更多是向選民展示「我幹了事」。但「幹成了什麼」？一年下來落地者寥寥。

作為營銷型而非實幹型人才，特朗普最青睞的戰爭手段，一定是對委內瑞拉的打擊模式，可惜此次對伊行動進展未如其意。特朗普期望的對伊打擊，是碾壓式空襲，決策強度在其精力和能力範圍之內；如果升級為地面戰爭，會讓特朗普捉襟見肘。

綜上所述，撤軍無疑是對特朗普本人和家族的最優解，但戰爭這一步邁出後，已經由不得其個人意願。伊朗雖然面對巨大的戰爭壓力也有談判意願，但最基本的安全保障要求如何滿足？戰爭損失如何補償？在特朗普個人和美國國家信譽喪失下，要求伊朗交出濃縮鈾的對價提議不可能被接受的，階段性的停火或緩和空檔期均會被懷疑為對方的戰備服務。

如果未達成協議而撤軍，中東局勢將發生深刻變化，現有的霍爾木茲海峽格局將固化，特朗普要如何收場？